

古今中外名作选摘

求知捷径·掌故軼事

人类重要思想集粹

黄志洵 编著

文化艺术出版社



求知捷径·掌故轶事

古今中外名作选摘

——人类重要思想集粹

文化艺术出版社

内 容 提 要

人类历史上下几千年，世界地域纵横数万里。在这个时空区域里，产生了无数的文字文化产品——书籍和文章。但是，现在人们的生活紧张忙碌，遍读既不可能，甚至寻找一些原作都有困难。此外，过量的信息竟然淹没了有价值的信息，太多的读物反而使人无所适从。

本书作者从世界的精神产品中挑选出近百部著作（主要是书籍），向读者介绍人类思想的精粹。书的内容包括社会科学、文学、自然科学三方面。除介绍作者生平、著作内容、社会意义外，还讲述了许多掌故和轶事。

本书内容丰富、文字流畅，并有精美插图。它不仅适合于中学生、大学生和研究生阅读，还可供教师、研究人员和成人自学者参考。

古今中外名作选摘

——人类重要思想集粹

黄志洵 编著

文化艺术出版社出版

中国科学院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售

787×1092毫米 1/32 11印张 241千字

1991年2月北京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印数：1—6000册

ISBN 7-5039-0712-6/1·350

定 价：4.90元

一切响亮的和声都会在空中消失，一切追求虚名的创作都会不见，只有真实的思想与事业永存。

——法朗士(A. France, 法国文学家)

在科学上没有平坦的大道可走，只有不畏劳苦沿着陡峭山路攀登的人，才有希望达到光辉的顶点。

——卡尔·马克思(Karl Marx)

作者介绍



本书作者黄志洵副教授, 1936年5月生于北京, 现在高校任教, 担任副系主任、攻读硕士学位研究生的导师, 是中国电子学会微波专业委员会委员, 美国电气与电子工程师学会会员(Member of IEEE)。

1981年发表专著《截止波导理论导论》。该书在国内外第一次把截止波导理论整理为一个完整的体系, 因而于1982年获全国优秀科技著作奖。

1988年发表科学史及科学学著作《科海浪花集》, 该书出版后受到科学界、高校师生的欢迎。

到高峰去呼吸

(代序)

联合国在1988年11月1日宣布，到这年年中的世界人口总数是5112298000人。这个人口数字当然不会是完全精确的，但在数量级上肯定十分可靠。人们叹息着地球上的局面实在是太过拥挤。同时，在这一片茫茫人海中，那些有杰出贡献的人越发显得珍贵。达芬奇(Leonardo da Vinci, 1452—1519)认为人是最神圣之物，“谁不尊重生命，谁就不配有生命。”这些话应用到一些思想家、科学家身上是再合适不过了。正是他们高举真理、智慧的旗帜，对广大群众进行了启蒙，带领人们前进。思想被描绘在作品中，而作品往往带有一种奇特的美……

人类的理念和情感的发展，是如此复杂如此曲折地交织在科学、哲学、文学、艺术之中，以致于在一般情况下没有人敢于尝试写一部《人类思想史》。学问之海太辽阔了，只有那种最狂妄自大的人才企图证明自己弄通了一切、解释了一切。

下面的文字，既反映了我的文化观点，也说明了写作本书的初衷。

一、文字文化的发展和书的历史

文字文化的历史极其漫长。显然，正是能够用语言、文字来交流思想和积累经验这一特点使人类区别于一切动物。赫胥黎(T. H. Huxley, 1825—1895)说过如下的一段话：

“只有人具有能创造可理解的、合理的语言的天才；就凭

这种语言^①，逐步积累经验和组织经验。但这些经验在其他动物中的情况是，当个体生命结束时就完全丧失了。因此，人类好像是站在山顶上，远远高出他那卑贱伙伴的水平，从他那粗野本性中改变过来，从真理的源泉里放射出光芒。”（见《人类在自然界的位置》）。

虽然近代的科学技术已经造成了音像文化的巨大发展，文字文化仍是各民族思维和记录的主要方式。最早的、远古的书写材料有：树叶、树皮、石、羊皮、亚麻布、甲骨、竹、木、帛、玉、陶、铜、铁、铅，等等。例如，公元前 2067 年至公元前 2025 年，巴比伦(Babylon)国王在石柱上刻出 282 条法律，成为历史上第一部法典。又如，中国古代曾广泛采用竹简，大约从商代(公元前 1600 年至公元前 1100 年)一直用到东晋末年(约公元 380 年)，以后才完全被纸取代。许多竹简联起来叫“册”，古代读书人对此无比熟悉。孔子是公元前 551 年出生的人，读《易经》时曾“韦编三绝”，就是说串联竹简的绳索或皮条断过三次。再如，公元前 451 年，罗马人把法律刻在黄铜板上。那么，秦始皇于公元前 213 年搞“焚书坑儒”，烧的什么书呢？当然不是刻在金属上的，而是竹帛之书。

总之，书的历史比纸的发明早很多。那么，人类历史上第一部书是什么时候才有的？！要回答这个问题，必须先确切地给“书”下一个定义。张秀民先生指出：“巴黎卢浮博物馆保存了约 4500 年前所写的埃及纸草(papyrus)一卷，可说是近代书籍的远祖。”这就是说，如承认埃及芦苇做成的纸草写卷是书，那么公元前二十五世纪以前就有书了。东汉人许慎曾著《说文解字》，他对书下过一个定义：“著于竹帛谓之书”。西周时代(公元前 1070 年至公元前 770 年)就有了帛书。总之，可以认

① 这里的“语言”应理解为语言和文字(本书作者注)。

为最早的书产生于中国,其时间是在公元前十一世纪之前。无论是竹简做的书,或是帛书,都可以把它卷起来,从而缩小体积,便于保存,这就是“卷”这个词的由来(它的英文是 volume)。

利用植物的纤维和适当的工艺,做成薄而柔软便于写字的材料,这就是纸。它是我们祖先的伟大发明。一般认为,是东汉时人蔡伦于公元105年正式把发明纸这件事上奏皇帝的。

简书、帛书都用毛笔浸墨后书写。这是一种手工制作书籍的基本操作。纸被发明以后,就有了纸写本,例如公元417年写的卷轴书《律藏初分》。唐贞观10年(公元636年)发明了雕板印刷。现存的世界最古印本书《金刚经》,是唐咸通9年(公元868年)出版的。

1041—1049年间,毕昇发明了胶泥活字。这一技术后来发展为木活字、铅活字,并传到日本、朝鲜。欧洲人最早看到的中国印刷品是元朝的纸币。众所周知,1423年欧洲人用雕板印了圣像,1450年采用了活字印刷术。

上述过程使我们想起英国作家威尔斯(H. G. Wells)说过的一句笑话:“他们是猴子变过来的;给他们时间吧!”……

印刷品的诞生,对人类进步起了无与伦比的促进作用。通过它,每一代人的经验得以保存,每一种卓越的思想得以流传后世。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不是等速向前,而是以加速度发展!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书的历史是一面镜子,从中照见了人类的历史。买书要付钱,因而书是商品。但是,书这种商品却与其他的千百种商品不同……在人们家庭里的书架上,在书店的柜台里,书一行行地排列着。它们无声地叙述人类的生活与斗争,欢乐与悲哀,成功与失败,心灵的搏动与感情的震颤……这是绵绵不绝的音乐和诗;这是力量;这是春日和风,

夏季闪电，秋天菊花，冬季雪峰。

书有自己的朋友，也有自己的敌人。历史表明，书的最可怕、最危险的敌人，是封建主义和专制主义。很遗憾，人类历史上发生过的几次大规模烧书、毁书事件，有两次发生在中国！

众所周知，最早、最著名的古代文化破坏史实是秦始皇的“焚书坑儒”。这发生在公元前 213 年，只有医药书、农林书、算卦的卜书得以幸免。虽然由于民间的藏书未能焚烧殆尽，而使中华民族文化的主脉未断，但受到惨重损失则是肯定的。次年（即公元前 212 年），秦始皇活埋了儒生 460 多人，此即谓之“坑儒”。应当说，烧书和迫害知识分子，虽然是不相同的两件事，但却有内在的逻辑上的一致性。

1933 年 1 月 30 日，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NAZI，即纳粹党）领袖希特勒（A. Hitler，1889—1945）被总统兴登堡任命为德国总理。从此，那个“年轻时维也纳街头的流浪汉，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的下士，战后在慕尼黑小旅馆里自言自语的失业者”成了七千万德国人民的领袖。这一事态发展不仅对德国，对世界人民，对文化传统都是灾难性的，人们很快就看到其后果了！1933 年 5 月 10 日夜晚，柏林大学对面的菩提树下大街的广场上，焚书的烈火映红了天空。一共烧了约 20000 册书，而希特勒的宣传部长竟然说：“这火光照亮了新时代。”

1966 年夏季，中国开始搞“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一运动很快发展成对文化的“革命”和对老干部及知识分子的迫害。正如叶剑英同志在 1979 年所指出的那样：“本来可以避免的错误未能避免，而是犯得更严重了……确实使人民利益受到严重损害。”在“文革”中，被焚烧、毁坏的书籍不可胜计，并旁及绘画、书法、文物、乐谱……这是真正的文化浩劫！

这个错误已在 1979 年被完全纠正过来。我们欣喜地看到,近十年知识分子迎来了出成果最多的历史时期。然而,惨痛的教训必须记取!“文革”时期的现代迷信,是靠“四人帮”的专制体制来推行的;而专制体制自身也要靠现代迷信来巩固和支撑。读者在阅读本书的过程中,一定会对此有更加深刻的感受。

二、中西文化的比较和近五百年来中国落后的原因

现在,我们来谈谈一个无法回避、也不应回避的问题,即中华文化在世界文化史中的地位。李约瑟(Joseph Needham)对此给予高度评价,但我们能否就此保持心理宁静则是问题。

本书统计表明,真正开辟全新方向的科学著作,在我国,古代确有不少,而近代则是很稀罕了!近几百年,中华民族的落后状态极其明显。最令人难堪的是,迄今为止最好的一部《中国科学技术史》并非中国人所写,而是英国人写的。

我们的牛顿、爱因斯坦在哪里?!我们的达尔文、麦克斯韦在哪里?!……我们民族占地球人口的 1/5,却没有 1/5 的科学贡献,也没有能与上述人物比肩的、真正有世界水准的科学家!直到今天,虽然我们有了庞大的科技队伍,但有人却仍然习惯于跟在洋人后面爬行,拾人牙慧。

中华民族是刚强的民族,智慧的民族,历史已证明,许多次强敌入侵都不能征服我们。本书收集的许多材料也证明,我们的传统文化博大精深,确实值得自豪!然而,近几百年来我们的落后极其严重,闭关自守与夜郎自大互为因果,这种精神贫乏到现在也没有完全消除。如果说,到唐朝时我国仍属于世界上的先进国家,那么自宋、元以后就再不能列入先进的行列。我们的文明缺乏深层次的发展。例如在天文学领域虽然观测记录连续、丰富、完整,但这种活动的动机基本上是由于视帝王为天子,视自然变异为“上帝示警”的迷信。就是说,

一切都必须依靠皇帝本人的重视，否则本书中提到的天文学家也都不会出现，就是出现了也没有可能受到支持。因而，我们这里没有哥白尼、开普勒、牛顿。一些人在谈论造纸、火药、印刷术、指南针这四大发明时虽包容着朴素的爱国主义情感，但有时候还有“吃祖宗老本”和自我麻醉的情绪。

中国在元朝时候，是大约有 5000 万人口的国家。1271 年，忽必烈定都大都，定国号为元。忽必烈就是元世祖，在位时间是 1260—1294 年。意大利人马可波罗(Marco Polo)在元世祖时来到中国，居住了十多年。回国后写的《马可波罗游记》最早系统地介绍了中国，使欧洲人为之震惊。但是，在这个阶段西方文化并没有系统地介绍到中国，两大文明缺少交流。意大利人利玛窦(Matteo Ricci)于 1582 年来到中国大陆，直到 1610 年在北京去世，前后共 28 年，被称为“西学东渐第一师”。他和徐光启合译欧几里得的《几何原本》，最先把西方学术思想介绍给中国人。

徐光启最先注意到中西文化的差异，认为我们所缺乏的(逻辑思维与推理)恰恰是西方人所擅长的。过去有两句诗说：“鸳鸯绣出从君看，不把金针度与人。”徐光启把《原本》的逻辑思维方法看作“金针”，把上述诗句改为“金针度去从君用，未把鸳鸯绣与人。”指出：“若此书者，又非金针度与而已，直是教人开矿冶铁、抽线造针。”可惜，徐光启的努力与建议，不曾被中国的朝廷和士大夫们所重视。

徐光启死于 1633 年。在这以后的 200 年间，中国虽然在农业、手工业、贸易方面有不少进步，但认识自然和客观规律的思维方法却停滞不前，就是说科技进展缓慢。吴敬梓在 1739—1749 年间写作了《儒林外史》，这部小说暴露了朝廷和知识界是同样的腐朽！然而，在与徐光启同时和以后的时间里，西方出现了开普勒(Johannes Kepler, 1571—1630)、伽

利略 (Galileo Galilei, 1564—1642)、牛顿 (Issac Newton, 1642—1727)、拉普拉斯 (Pierre Simon Marquis de Laplace, 1749—1827)、奥斯特 (Hans Christian Oersted, 1777—1851) 等人, 他们的成就是我们无法企及的, 中国人被大大地抛在了后面!

1840 年鸦片战争以后, 西方列强用兵舰大炮来同庞大然而虚弱的“中央帝国”打交道了! 每一次交战都以“中央帝国”的失败告终 (虽然在有的局部性战役中有过小胜)。这使中国人再次进行反省和展开争论。一位重要的代表人物是严复 (1853—1921)。他以毕生精力翻译出版了多种西方学术名著。他认为, 为了“自强保种”, 此乃要务。“西洋之学, 自明以前, 与中土亦相埒耳。”就是说, 关键的拉开距离, 是明以后的 200 多年。他认为, 西方人的方法是: “一理之明, 一法之立, 必验之物, 物事事皆然, 而后定之为不易。”这种科学精神和研究方法是中国人所应学习的。但是, 严复并不完全否定中华文化, 例如他在“译《天演论》自序”中多次提到《易经》。

众所周知, 1919 年发生的五四运动以猛烈的火力批判攻击了儒家封建文化, 提倡民主 (Democracy, “德先生”) 和科学 (Science, “赛先生”)。出洋留学成为一时风尚, 人们向西方学习科技、法律、医学、文学等。另外一派知识分子“以俄为师”, 接受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 从事以改造社会为目的的革命活动。革命胜利后, 就有可能实现伟大的文化复兴。

综上所述, 我们看到各个时期的知识分子都关心中西文化之比较。现在, 再介绍 1949 年以前和以后的有代表性的观点。

钱穆先生在其所著《中国文化史导论》(1948) 一书中问道:

“……在中国传统文化机构里, 为何没有科学的地位呢?”

……中国要学习西方科学是否可能呢？……中国科学化了，那时是否将把中国固有文化机构损伤或折毁呢？”

在列举了中国古代科技成就之后，钱穆先生说：

“在中国传统文化里，虽说未尝没有科学，究竟其地位并不甚高。……第一东西双方的思想习惯确有不同，东方人好向内看，而西方人则好向外看。因此太抽象的偏于逻辑的思想与理论，在中国不甚发展。……中国人听到哥白尼地动说、达尔文进化论等，只觉其是一番证据确凿的新知识，并不觉得它有惊天动地的伟大。……再说到科学应用方面，科学发展，多少是伴随着一种向外征服的权力意识而来的，那种意识又不为东方人所重视。……火药罗盘雕板印刷三项大发明，只有印刷术一项，在中国社会上始终为人看重。火药则用来做花炮。……中国人没有一种远渡重洋发展资本势力的野心，因此罗盘应用也不能像西方般发挥尽致。”

钱穆先生又说：

“中国在很早的时期，便已凝成一个统一的大国家。在西方则直到近代，由中国人眼光看来，依然如在我们的春秋战国时代，列国纷争，还没有走上统一的路。中国历史正因为数千年来常在一个大一统的和平局面之下，因此它的对外问题常没有像它对内问题那般的重要，因此中国人的态度，常常是反身向内看的……西方历史则永远在列国纷争、此起彼伏的斗争状态之下……因此西方人的态度，则常常是向外看的。”

上述观点可能对历史现象提供了某些解释。就说文化专制主义吧，虽说希特勒统治德国的12年(1933—1945)与“四人帮”统治中国的10年(1966—1976)有相似之处，但前者对外国肆行军事侵略，后者则专心迫害本国的老干部和文化人，两者的溃灭方式也就不同。

关于中西文化发展的比较，世界史学者秦晓鹰分析了中

国的情况：

“封建社会初期，诸子百家虽然有各自不同的理论体系，但都将文、史，特别是哲学放在至尊的地位，而将生产技能与科学技术排斥在知识范围之外。哲学家、诗人，特别是阐述统治阶级政治伦理的幕宾、修史，名望极高，堂而皇之地出入官庭，而直接参与生产实践的人……被看作匠人，打入社会底层。

“……在中国封建小农经济条件下，商品经济不发达。科技发展仅当作小生产工具的延长，无实质性意义。……大平原农耕地区，陕西作物品种与河南河北相差无几。

“……由于缺乏社会生产的呼唤，中国的科技成果很多变成内宫的玩物。……平民只能在外边耕种土地，将生活维持在最低水准上。”

至于欧洲，“商品经济发展很快。……分工导致了对人的智能的尊重，对掌握了知识的人的尊重。”

1988年9月12日，某报刊登一张图表，从9项数据的对比说明，中国的生产力水平大约比美国落后100年。对这种统计分析要头脑清醒，首先要看到1949~1989这四十年，中国已大体上完成了工业化或工业革命。其次，必须承认我们与工业科技最发达的美国相比还有不小差距。

……只有承认落后，才有改变落后的可能。只有面对现实，紧迫感、历史的使命感才会在胸中激荡，推动我们向前！

存在这么多问题，那么，怎么办？！女作家陈若曦说得好：“中国的存在是永恒的，她的子民不可悲观失望。”

三、了解和阅读经典文献的意义

世上已经有了那么多的书籍和论文，各种学科文献浩如烟海，如恒河之沙不可胜数。这就不免使缺乏经验的人们感到迷惑：阅读应当从哪里开始？！还有的青年人提出了有

意思的问题——既然已经有了那么多的出版物，为什么还有许多人写书，有许多印刷厂印书？！

的确，现代生活的矛盾现象之一是过量的信息反而淹没了最有价值的信息，太多的读物反而扼杀了读物，造成了读物的贫乏！人们面对这么多的出版物，反而不知道读什么好。许多书籍互相重叠反复，甚至抄来抄去，真正有价值的信息反而被淹没。这真是可悲的状况。

其实，在那像海洋一般的出版物中，真正有价值的只有千分之一，或许只有万分之一。现代人的时间有限，对阅读的对象不能不有所选择。既然最重要的科学文献并非“不可胜数”，那么编选一本“人类杰出科学作品精选”应当是可能的。本书就是这种努力的一次尝试。

本书介绍了多个学科中的名著。我们力求向读者传达出原作的精神风貌，实际上是和读者一起追寻过去的踪迹，整理出那些对人类进步贡献最大的读物。这个工作并不容易做，现在虽然做了也并不完整。但是，我们相信今天的中国社会需要这样的一本书。此外，在“提倡阅读原作”方面，我们也希望能够起点推动作用，使之蔚然成风。

本书搜集的绝大部分著作是好的，值得人们保存、阅读、推崇。这是不错的。然而，必须指出，某些著作有时候也起着阻碍进步，影响发展的效果——例如古希腊大思想家亚里士多德(Aristotle，公元前384—322年)的作品，中国古代哲人孔子的著作等都是如此。同一本书可以起两种效果（而且两方面都相当强烈），这是一种惊人的历史文化现象，非常值得重视。

这当然就是人们常说的“历史的局限性”。任何个人（不管如何被冠以“伟大的××家”的封号）都不能超越他自身所处的那个时代。因而，任何一种著作，其价值都只能是相对的。

这就是我们在如此丰富和珍贵的文字文化遗产面前所必须持有的历史唯物主义态度——一种冷静和审慎的态度。

正像发霉的粮食、有毒的食品可能给人的身体造成巨大损坏一样，在一定条件下文字读物也将产生害处。对这样的书的情况，一无所知并不好，应当略加介绍，但是态度要非常严肃。

庞加莱(Jules Henri Poincaré, 1854—1912)认为：“生命不过是两个无穷长黑暗之间的一道闪光。”爱因斯坦说：“每个人都在这个世界上作短暂的逗留。目的何在？却一无所知。”中国人则用“白驹过隙”来形容人生的短暂。确实，几十年在历史的长河中不过是一瞬间。人们降生到这个世界上，力图把世上的事理出个头绪来，往往是尚未如愿即遵循生物规律消失。因此，我们看到的一切出版物不过是那个时代的逻辑与理性思考的记录。概括成一句话便是，不同时代的人们思考他那个时代的问题，作出自己的答案。实际上，本书搜集的材料，范围很广，涉及到宇宙构成、生命来源、人生意义、行为模式、物质内蕴、科学精神……我们建议读者们在读了本书之后，再去查阅原著。

四、对本书内容安排的说明

本书共 77 小节，在内容的安排上，大约文科、理科各占一半，其中有 $\frac{3}{4}$ 是书籍，其余 $\frac{1}{4}$ 是文章。从作者的国籍来看，涉及世界上的 16 个国家，其中有 4 个国家（中国、英国、美国、德国）占了全书的 $\frac{3}{4}$ 。这当然表示它们对思想、文化具有极突出的贡献！

从本书可以看出，公元前的人类文明主要是中国的华夏文明和希腊文明，这种情况延续到纪元以后的很长时期。十六世纪以后，欧洲文明迅速崛起，中国文明却缺乏深层次的发展。十九世纪，这是欧洲文明的高峰期！进入二十世纪以后，

先是欧洲文明、美国文明共领风骚,以后就转到以美国文明领先,执世界之牛耳。当今之世,欧洲文明仍在发展,中国文明则出现了新的势头。

这就是不带成见的统计分析。它给我们以有力的启示。现在全世界都在关心中国的进步,预计在二十一世纪将再次出现中国文明的新的全面高涨的时期。

最后,我们用罗曼·罗兰(Romain Rolland, 1866—1944)的一段话作为本文的结束:

“我不说普通人都能在高峰上生存,但一年一度他们应当上去顶礼。在那里,他们可以变换一下肺中的空气和脉管中的血流。……以后他们再回到人生的荒原,心中充满了日常战斗勇气。”

黄志洵

参 考 文 献

- [1] 钱穆,《中国文化史导论》,1948;重印本:上海三联书店,1988
- [2] 张秀民,《中国印刷术的发明及其影响》,人民出版社,1958
- [3] W. L. Shirer,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Third Reich》, Simon and Schuster, 1960。中译本:《第三帝国的兴亡》,世界知识出版社,1979(译者董乐山等)
- [4] T. H. Huxley, 《Evolution and Ethics》,1865年。中译本:《天演论》,商务印书馆,1981(重印)(译者严复)
- [5] 陈卫平,“探索的印迹——中西文化的比较研究”,百科知识,1985, No. 8, 12—14
- [6] 秦晓鹰,“知识分子的‘官本位’和参与意识”,文汇,1987, No. 8, 58—60
- [7] 王元化,“论样板戏及其他”,文汇,1988, No. 4, 2—5
- [8] 戴文葆,“徐光启”,出版工作,1988, No. 7, 117—124